

殷墟王陵早期被盗年代研究

何毓灵

关键词：殷墟王陵 灰坑 小墓 早盗坑 西周早期

KEYWORDS: Royal Mausoleums at Yinxu Site Ash Pits Small-sized Tombs Early Robbing Tunnels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BSTRACT: To judge the earliest date of the robbing of the royal mausoleums, one should consider not only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robbing tunnels but also the special natures of the robbing tunnels in the early times. The typological analyses to the pottery *li*-cauldrons and *gui*-tureen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unearthed in Yinxu Site showed that the potteries unearthed from the early robbing tunnels belonged to the mid Western Zhou Dynasty, but some small-sized tombs and ash pits superimposed over the royal mausoleums belonged to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destroying of the royal mausoleums in Yinxu Site consisted of two stages, and finally finished during the second eastward expedition of Duke Zhou. The reason why the royal mausoleums were destroyed was that the burials of the ancestors were the objects of worshipping and protecting of the descendants, and therefore they became the first choice for the enemies to destroy to vent their anger.

近年来，有学者重新关注殷墟王陵被盗毁的年代与原因问题。与早期的研究相比，取得了长足进展。受此启发，笔者重新研读王陵区发掘报告，并拜读各家观点，亦就殷墟王陵西周时期被盗毁的年代及其原因谈点认识。

一、既往研究

位于洹河以北西北冈的殷墟王陵主要发掘于1930年代^[1]，可惜全部被盗毁。发掘者也曾注意被盗毁的时间，或认为“距埋葬之后很近”^[2]，或把大型盗掘坑称为“早盗坑”^[3]，而且在78AHBM1的早盗坑中发现“殷代晚期及西周陶片”^[4]，并指出84AWBM260早期被盗掘时间“约在商末周初”^[5]。

最近，井中伟详细讨论殷墟王陵早期被盗的年代与背景^[6]，他判定“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早盗坑的发生年代约当西周早期”。并称西周早期大肆盗掘殷墟王陵“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武庚叛乱的惩罚，更深的目的则是要‘以绝殷祀’”。

但有学者并不赞成，认为早盗坑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早期晚段，而以西周中期的可能最大”，由于“时间与周公东征错位，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周公将士所为了”，但“究竟何人所为，……也不能提出更好的推测”^[7]。

井中伟正确地判定了殷墟王陵最初被盗毁的时间，并结合该时间段，指出盗毁王陵应与周公二次东征有关，其原因是周人想从根本上消除王朝被颠覆的隐患。但他在判定时间上

作者：何毓灵，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使用的证据、特别是文中提到的盗掘坑出土陶器年代属西周早期是不准确的。虽然结论是正确的，但支撑结论的论据值得讨论。

张文中指出这一问题，认为这些陶器的年代应属西周中期。可因西周中期殷墟已成废墟，无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与之对应的事件，因而也就无法回答此时盗毁王陵的理由。

上述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都忽视了当时条件下早期盗掘坑的形成及回填的复杂性，因而也就无法合理地分析早盗坑的形成与回填时间，对打破王陵大墓的早期灰坑与小型墓葬的年代也未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也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王陵被毁弃的过程。本文结合殷墟及周边地区最新发现的西周时期的考古学资料，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二、早盗坑的形成与回填时间

早盗坑的年代属西周时期已无疑问。但依据地层学原理，晚期遗迹叠压或打破早期遗迹，叠压或打破的时间应以晚期遗迹内最晚器物的年代作为年代判定的依据。如果按这样的基本原理判断，似乎无法得出早盗坑年代是西周早期或中期的结论。因为在这些大型盗坑内还有更晚的器物出土：如M1001早盗坑内有“开元通宝”铜钱、淡绿色印纹瓷片、白色瓷碗残片、铁钉、铁矢、铁块等，其中铁块位于早盗坑9.2米深处。如此说来，把大盗坑的年代判定为两汉或隋唐时期更符合考古学原理。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偏差呢？原因就在于这种特大型盗掘坑的形成与回填的特殊性。王陵之上的大盗坑与墓葬等深，口径与墓葬坑口相当，有的还大于坑口面积。粗略计算，每个大盗坑的土方量约为1200立方米。从地表到地下10米，掏挖1200立方米土，对于当时的生产力来说是很难的。即便是国家行为，动用了军队力量，盗掘王陵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正如井中伟所言，盗掘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墓葬中珍贵的随葬品，更主要的是“以绝殷祀”。出于这样的目的，周人在盗掘之后会不会组织人力进行回填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不只是盗掘，回填也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既然是出于泄愤、恫吓、断绝殷祀的目的，那么周人就更没有理由再组织人力进行回填了。二是王陵发掘者注意到，有些盗坑内有雨水冲刷的淤积土，这说明盗掘后，盗洞没有立即被回填，而是任由风雨侵蚀。三是发掘者推测，挖掘盗洞时，把上层的土堆在一边的底部，盗洞下层的土堆在上部。回填时，原来盗洞下层的土又重新回填到盗洞下层。如此，越靠近底层，出土的遗物越丰富。但这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晚期器物如铁器、瓷片会出于盗洞深9米以下。实际上，由于从地下10米左右把土运到地面，在当时条件下，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与物力。笔者推测，在盗掘至椁室顶部时，木质椁室尚未腐蚀塌陷。钻入椁室内取走所需随葬品后，其他随葬品被打碎、弃置，这才是盗坑下部随葬品较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上述不谬，那判定早盗坑形成的年代就应充分考虑到早盗坑的特殊性。笔者同意张文把早盗坑出土的典型陶器、铜器的年代判定在西周中期或者西周早期偏晚，但不认为这些器物代表了早盗坑的形成时间即大墓被盗掘的时间。如果早盗坑未被有意识回填，而是靠自然之力日积月累地被填塞的话，这些所谓的典型陶器和铜器完全有可能是后期人类活动留下的遗物。从地层关系来看，把这些遗物看作是早盗坑形成之后的遗物更合适。也就是说，早盗坑的形成时间要早于这些典型器物所代表的西周中期或早期偏晚阶段。

早盗坑被“回填”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挖开之日始，一直持续到两汉甚至隋唐时期。这个过程主要是自然之力，自然的

侵蚀、风力乃至农耕需要。直至汉唐时期，所有早盗坑才全部被填埋。汉唐时期的墓葬又打破了这些早盗坑。

事实上，不仅是王陵区被周人盗毁，殷墟范围内几乎所有带墓道的贵族墓葬可能都在同一时期被大肆盗毁。这一点井文有所提及，在此再补充两点。

其一，在发掘较大墓葬特别是带墓道墓葬时，经常会发现在一些盗洞中有大块的红烧土甚至是建筑构件。这些红烧土和建筑构件应来自于殷墟时期的夯土建筑之上。如小屯西地M1是一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8]，“中部有一椭圆形盗坑，时代可能较早”，盗坑中“出土大量的建筑倒塌的红烧土堆积……从特征看均为商代建筑残件”。理论上来说，这些残件形成的年代要早于盗坑的年代，但也不会太早。因为在盗坑中几乎未见晚于建筑残件的器物，这也是发掘者推测盗坑“时代可能较早”的依据。从时间段上来说，房屋被烧毁与墓葬被盗可能是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反映，二者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其二，王陵区之外已发掘的带墓道大墓全部被盗^[9]，而且首次被盗的时间普遍较早。这种几乎没有遗漏的现象只能说明，当时的盗掘者有着确切的信息来源。

三、大墓之上早期灰坑与墓葬的年代

报告显示，除了早盗坑打破王陵大墓，还有一些灰坑和小型墓葬、甚至是瓮棺葬打破大墓。这些灰坑与墓葬的年代多数被王陵发掘者判定为“小屯文化时期”，其主要依据是灰坑、墓葬内出土的器物、墓葬形制与葬式等。也有个别明确的地层关系可以说明早盗坑、墓葬、灰坑及大墓的关系，如小墓M1043打破王陵M1004，而M1043被早盗坑打破，墓主盆骨以下被毁。一座深达4米的大型灰坑打破78AHBM1，而灰坑又被早盗坑打

破。发掘者认为，灰坑内陶器年代属殷墟第四期。

尚有一种现象值得重点指出，灰坑与小墓主要分布在大墓的墓道及周边位置，在大墓的墓室处只有大型早盗坑而不见灰坑和小墓^[10]，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墓室处的灰坑与小墓被早盗坑打破了。

这些早期灰坑与墓葬的年代果真属“小屯文化期”吗？笔者不以为然。有学者指出，殷墟文化第四期五段的年代就属于西周初年^[11]，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下面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说明王陵区大墓之上的早期灰坑和墓葬的年代不属于“小屯文化期”而属于西周早期。近些年，殷墟遗址内西周早中期的资料又有所增加，极大地增强了对西周早中期文化特征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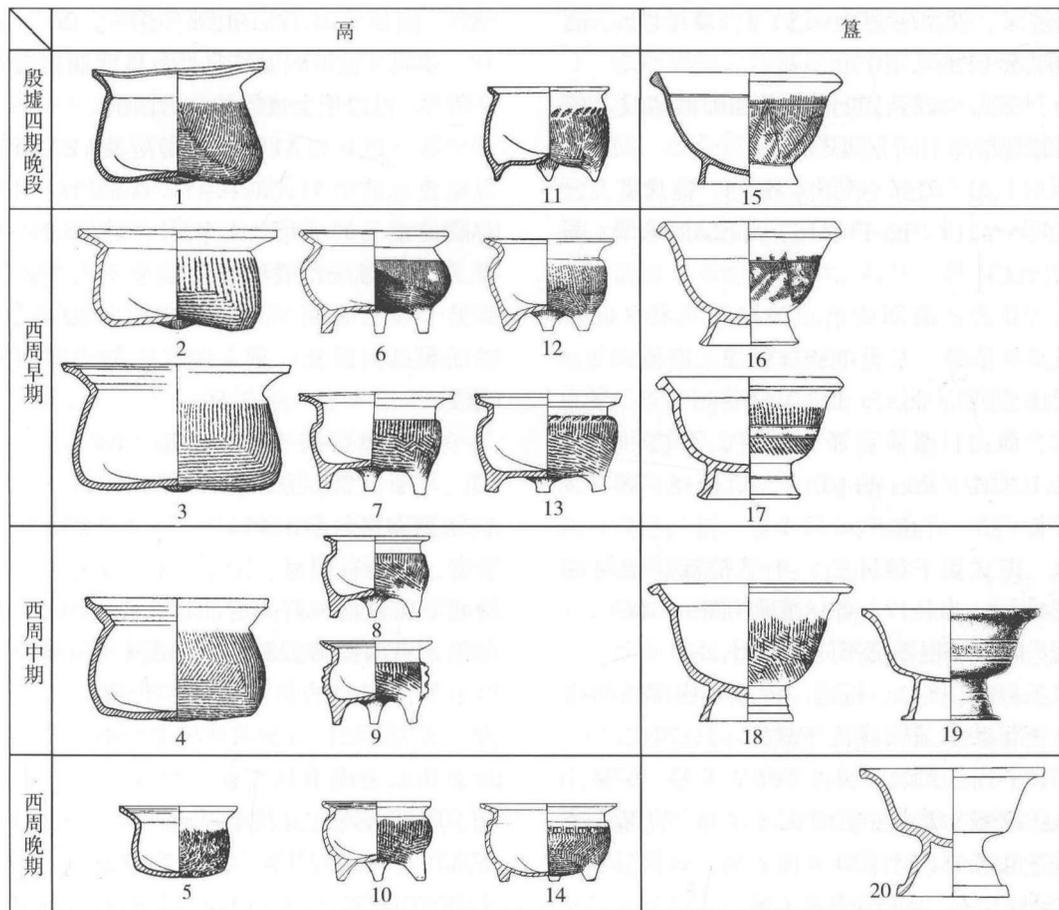
殷墟所在的洹河流域曾于1960^[12]、1970^[13]、1990^[14]年代进行过三次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西周遗址，发掘了数座西周晚期的墓葬^[15]；在小屯殷墟宫殿区甲四基址东北部发现2座西周晚期的墓葬^[16]；在刘家庄北地发掘了26座西周墓，部分墓葬的年代被认为属西周早期^[17]；在殷墟西部的孝民屯遗址内发现西周时期的墓葬9座，多属于西周早期^[18]；在侯家庄村南发现西周晚期的车马坑和墓葬^[19]；安阳市西高平村西北部西周早期到中期偏早的遗存最丰富^[20]；在安阳市黄张村发现有西周晚期的灰坑^[21]。据上述资料以陶鬲、簋为例对殷墟范围内的西周陶器进行分期^[22]，并对其年代做出判断。

陶鬲 据袋足、裆部不同分三型。

A型：宽沿，无足跟，肥袋足。多饰粗绳纹。依口沿、裆部不同分五式。

I式：器形大体呈方形，口沿与腹部夹角较大。后冈HGH10：28，口径23.6、高16厘米^[23]（图一，1）。

II式：见于孝民屯、西高平遗址。器物矮扁，口沿下压，与腹部夹角变小，裆部更



图一 殷墟西周遗存陶鬲、簋分期图

1、15. 后冈HG10 : 28、26 2、6、12、14、16、17. 孝民屯M788 : 2、M687 : 2、M937 : 2、M844 : 4、M788 : 3、M872 : 1、3、4. 西高平04AXH87 : 1、04AXH18 : 26 5. 小屯M2 : 4 7、8、9、13、18. 刘家庄北地M75 : 3、M126 : 1、M104 : 2、M140 : 1、M81 : 1 10、20. 侯家庄南地M13 : 2、1 11. 殷墟西区M219 : 1 19. 王陵区M1004 : 3 : 3113

低。孝民屯M788 : 2，口径24.8、高12.7厘米（图一，2）。

Ⅲ式：主要见于西高平遗址。几乎不显裆部，口沿内开始有数周凹弦纹。西高平04AXH87 : 1，口径30.2、高16.6厘米（图一，3）。

Ⅳ式：器物变小，裆部近平，口沿内普遍饰凹弦纹。西高平04AXH18 : 26，口径24.5、高15.9厘米（图一，4）。

V式：无裆，底近平。小屯M2 : 4，口径17.7、高9.5厘米（图一，5）。

B型：小方唇，折沿，束颈，足跟平。腹部饰绳纹。依器形不同分五式。

I式：颈部不明显，腹部外鼓。孝民屯M687 : 2，口径18.7、高12.7厘米（图一，6）。

Ⅱ式：颈部较长，与肩部折痕突显，腹部变瘦，分裆不明显。刘家庄北地M75 : 3，口径19.2、高12.5厘米（图一，7）。

Ⅲ式：器物变小，裆部近平。刘家庄北地M126 : 1，口径13.2、高10.4厘米（图一，8）。

Ⅳ式：与Ⅲ式相比，突出的变化是口沿内有多条凹弦纹，腹部有两条竖向扉棱。刘家庄北地M104 : 2，口径14、高10.4厘米（图一，9）。

V式：裆更低，足外撇更甚，口沿内凹

槽较深。侯家庄南地M13:2,口径13.6、高10厘米(图一,10)。

C型:方唇,折沿。肩部饰戳印纹。依裆部与足部不同分四式。

I式:肩部不突出,分裆,锥状足。殷墟西区M219:1,口径16、高12.4厘米^[24](图一,11)。

II式:肩部突出,分裆不明显,近弧裆,平足跟。孝民屯M937:2,口径16.2、高11.5厘米(图一,12)。

III式:通体扁矮,鼓肩,平裆,平足跟。刘家庄北地M140:1,口径18、高12.4厘米(图一,13)。

IV式:下腹外凸,平足很低。孝民屯M844:4,口径17、高9.8厘米(图一,14)。

陶簋 据器形不同分两型。

A型:侈口,折沿,深腹。腹部饰绳纹和三角划纹。依口沿、腹部不同分四式。

I式:大敞口,口沿略呈方形,深腹,圈足较矮。腹内壁折棱靠近口沿,腹部饰简单三角划纹。后冈HGH10:26,口径26.4、圈足径13.6、高15.4厘米(图一,15)。

II式:口部变薄,截面呈三角形,腹内壁折棱下移至腹部,腹部浅,圈足略高。腹部饰三角划纹。孝民屯M788:3,口径23、圈足径12.3、高15.4厘米(图一,16)。

III式:口沿斜伸,腹部三角划纹消失。孝民屯M872:1,口径23.6、圈足径12.8、高15.4厘米(图一,17)。

IV式:腹部变瘦,圈足较高,圈足下部开始外伸。刘家庄北地M81:1,口径20、高14.8厘米(图一,18)。

B型:方唇,卷沿外伸,斜腹。分两式。

I式:圈足较粗,下部外伸,腹部饰横向或竖向“S”纹。王陵区M1004:3:3113,口径22.2、圈足径12.4、高13.9厘米(图一,19)。

II式:仅见于侯家庄南地。腹变浅,圈足变成细腰喇叭状。侯家庄南地M13:1,口

径23、圈足径14、高16厘米(图一,20)。

参照其他地区尤其是邢台地区西周陶器分期^[25],可以把上述陶器分为四组。

第一组:以AI、CI式陶鬲及AI式陶簋为代表。其中AI式鬲和AI式簋是殷墟四期晚段最常见的器形,也被看作该期的标准器。CI式陶鬲在殷墟时期数量不占主体,首见于殷墟晚期,其肩部纹饰为戳印纹,特征明显。因此,第一组年代为殷墟四期晚段。

第二组:有AII、AIII、BI、BII、CII、CIII式陶鬲及AII、AIII式陶簋。其中A、C型陶鬲与A型簋和第一组同类器既联系紧密,又特征明显。A型鬲几乎没有裆部,沿面下压,沿内开始有凹槽;C型鬲已成平足跟,肩部突出。A型陶簋仍饰三角划纹,但由第一组时的折沿变成了折腹,口沿变薄。这些器物特征深受殷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开始表现出新文化的特性。在洛阳成周、邢台西周遗址甚至是琉璃河遗址中A型陶鬲和簋也较为常见。在这些遗址中,这些式别的陶器被认为是西周早期的典型器物。孝民屯M937:2的陶鬲与西周早期曲村出土的陶鬲(M113:36)^[26]十分相似,刘家庄北地的陶鬲(M140:1)与邢台南小汪遗址西周早期A I式柱足鬲(T11⑤:3)^[27]形制相当。有学者认为刘家庄北地的陶鬲(M140:1)应为西周康王时期^[28],B型陶鬲也是由殷墟分裆鬲演化而来,此时分裆已不明显,或曰弧裆,柱足,束颈,鼓肩,洛阳北窑^[29]及琉璃河燕国墓地^[30]中也能见到。其中BI式陶鬲与北窑M93:4相近。与被认为属西周早中期的曲村M13:35陶鬲^[31]相比,BII式孝民屯M872:2与之相当。综上所述,第二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

第三组:有AIV、BIII、BIV式陶鬲及AIV、BI式陶簋。AIV式鬲几乎看不出裆部,袋足直接着地,口沿内普遍有凹弦纹。与属西周中期的邢台南小汪II式分裆袋足鬲^[32]

相当。B型鬲器形变小，腹部变瘦直，BIV式鬲腹部饰扉棱，口沿内多见凹弦纹。有学者认为刘家庄北地M104出土的2件陶鬲与洛阳C3M198:1陶鬲^[33]相当，属西周中期偏早^[34]。在邢台西周遗存中，B型陶鬲十分常见，被学者判定始于西周中期^[35]；该型陶鬲在沔西也有发现。这种平裆柱足、“常在肩腹处饰鸡冠状扉棱”陶鬲始于西周中期偏早^[36]。AIV式陶簋口沿斜平外伸，圈足变高，圈足底部向两侧外伸。腹部饰“S”纹的BI式陶簋是新出器类。“S型纹饰，年代标识性较强，在第二期出现，使用于第二期和第三期”^[37]。综合判断，第三组应属西周中期。

第四组：有AV、BV、CIV式陶鬲及BII式陶簋。这些器物以前在殷墟多有发现，时代应属西周晚期。

通过类型学分析可知，肥袋足陶鬲是殷墟地区商末周初最典型的器形，到西周时期演变序列仍相对清楚。王陵区大墓报告中多处提到在灰坑与墓葬中发现有肥袋足陶鬲，且被当作认定遗存时代的主要依据。如M1002之上的灰坑、M1004之上的灰坑16、与M1500有关的HPKK1和HPKK2及打破77AHBM1的大型灰坑内都有宽沿肥袋足陶鬲。参照王陵发掘报告可知，打破M1001的小墓M1054、M1061，打破M1002的小墓M2251，打破M1004的小墓M1219，打破M1217的小墓M1506，以及打破M1550的小墓M1628之内也都随葬有肥足绳纹鬲，而这些肥足绳纹鬲就是殷末周初的无跟大袋足陶鬲，器形更加矮扁，口沿与颈部的夹角近90度，几乎不显裆部。与AII式陶鬲相当。

如果这些灰坑及小墓属殷墟时期的话，也就是说当时是允许灰坑和小墓打破大墓的，可为何时间集中在殷墟四期呢？为何没有殷墟其他时期的灰坑和小墓打破大墓呢？显然这是不成立的。结合部分小墓被早盗坑打破的地层关系判断，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

些灰坑与小墓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

众所周知，殷墟墓葬中常见有腰坑，即使是小墓也不例外。但已报道的小墓未见有腰坑的。40余座被判断属于“小屯文化期”的墓葬没有一座墓有腰坑，这只有一种可能，即这些墓葬的主人不是殷人。

殷墟墓葬随葬品中，陶觚、爵的比例占60%~70%。而这批墓葬中没有陶觚、爵，随葬陶器最多的是单件陶鬲，另有罐、簋和豆等。这种随葬品组合方式也不是殷人的传统，而是周人的习俗。孝民屯遗址内最常见的墓葬陶器组合就是鬲、簋、罐，刘家庄北地也以鬲、簋、豆、罐相互组合。可见，大量不随葬陶觚、爵的小墓打破王陵大墓，墓主应是周人而不是殷人。

除灰坑与小墓外，大墓之上还有一些瓮棺葬。殷墟时期，不论是作为祭祀牺牲还是一种墓葬形式，瓮棺葬都与夯土房基有关，作为祭祀牺牲埋在夯土基址、门道、入口、基槽内。如果是夭折的婴儿，其埋藏的地点在房基周围。王陵区大墓之上出现的这些瓮棺葬显然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

综合分析，这些王陵区大墓之上的小墓和瓮棺葬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解释其表现出的种种不同于殷墟时期的特征。小墓与瓮棺葬在大墓上出现，应是周人对殷人采取的措施。

四、殷墟王陵被毁原因蠡测

先祖之墓历来受到其后人的敬重与保护。正因如此，也就成为敌方泄愤、毁坏的首选之地。考古资料显示，在陶寺遗址内，属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打破早、中期大墓的现象已不少见。发掘者认为，这种捣毁行为与毁宫殿、扒城墙一样，是暴力行为^[38]。

郑国公室的祭祀坑及殉马坑在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39]。而该区域内发现战国中晚期墓葬93座，绝大多数为小孩墓葬，另有25座瓮棺葬，这些“战国小型墓和瓮棺排列密

集有序，绝少有打破关系，并集中在遗址中心一条线上，恰与礼乐器坑和殉马坑方向一致，系韩人残郑社稷之表现”^[40]。这种在前朝核心祭祀区内埋葬小型墓与瓮棺墓的行为，与殷墟王陵之上的西周小型墓与瓮棺葬反映了相同的理念，即以这种方式达到对前朝辱没的目的。

此外，对敌方的家族墓地采取极端措施，也屡见于文献记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史记·楚世家》：“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白起……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战国策》：“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

虽然学术界对夷陵是否为楚王陵还有不同的认识，但烧先王之墓，以辱没“先人”应是事实。《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与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晋人以挖开家族墓葬的手段威逼曹人，这从侧面说明先人之墓不可辱，宁可失去城池，也要保护。《史记·田单列传》：“（田）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为激发民众御敌之心，施反间计，让敌军掘民众祖先之墓以达到羞辱民众的目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为报私仇，鞭尸泄愤。掘墓鞭尸的行为，对墓葬的破坏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五、结 语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殷墟王陵在早盗坑之前，已进入被毁灭的进程中。殷墟王陵的废弃，实际上应经历了两个过程。

周人灭殷之初，设“三监”，让纣子武庚继续“俾守殷祀”，以达到稳固的目的。但这并不表明殷都没有受到损毁。《逸周书·世俘》：“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辛亥，俘殷王鼎”。周王极力宣扬的“以承天命”的背后，实际上伴随着大肆抢夺，这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在山西北赵晋侯墓^[41]、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42]、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43]均发现殷墟晚期的玉器。有学者认为陕西戴家湾出土铜器中大部分年代为商末周初^[44]。有学者进一步推测，其中的一部分青铜器当系“班赐宗彝，分殷之器物”的结果^[45]。除了抢夺宝物之外，可能还伴随着焚烧建筑等行为。在王陵之上挖坑、筑墓、埋夭折的婴儿等，从心理上是对殷人的沉重打击。

表面的怀柔政策并未取得长治久安的效果。武王伐纣二年后崩，成王年幼继位，周公辅政，这引起了周王室内部的猜忌与争斗，“三监之乱”由此产生。周公借机二次东征，平定了叛乱。此时，殷人势力彻底瓦解，周王朝再也不需要安抚殷遗民，而是要从心理上击垮殷人的顽固势力，这样捣毁王族和贵族陵墓就成为不二选择。所有王陵及贵族墓葬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盗掘一空。同时，原来殷地上的“殷顽民”被大批分封、迁徙他处。至此，殷墟开始沦为一般性聚邑。

被盗毁的王陵及贵族墓并未人为回填，而是靠自然之力慢慢积淀。晚至汉唐之时，所有盗掘坑才全部填满。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BKG008）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1YJC780002）资助。

注 释

- [1] a.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b.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c.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d.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e.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f.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七本·1500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
g.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八本·1550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76年。
h.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1400、1443、1129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i.石璋如：《侯家庄第十本·1005、1022等八墓与殷代的司烜氏》，历史语言研究所，2001年。
- [2]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第42页，1948年。
- [3] 同[1]。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 [6] 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与背景》，《考古》2010年第2期。以下简称井文。
- [7] 张敏：《殷墟王陵上的晚期遗迹及早期盗掘坑年代辨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以下简称张文。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9期。
- [9] 2009年，殷墟王裕口南地发掘一座带一条墓道的墓葬，未被盗掘。该墓虽有墓道，但规模较小，出土陪葬品也与墓葬规模不符。从铭文推测，该墓可能是一座贞人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 [10] 这一点，张文注释中也曾指出。
- [11] 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河南安阳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13] 安阳市博物馆：《豫北洹水两岸古代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学技术实验室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第10期。
- [15]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第7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 [18] 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 [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市西高平遗址商周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张发掘队、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河南安阳市黄张遗址两周时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4期。
- [22] 为了更充分说明殷墟遗址内西周时期陶器与殷墟时期陶器的关系，特选取了殷墟文化四期晚段的后冈圆形祭祀坑内出土的陶鬲、簋与之对比分析。

-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275页图二〇二、1,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 [25] 贾金标、任亚姗、郭瑞海:《邢台地区西周陶器的初步研究》,见《三代文化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该文中的A型、B型陶鬲形制与演化规律与本文所及西周陶鬲几乎相同。
- [2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商周遗址》第140页图七三、2,文物出版社,2011年。
- [2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应国墓地》第216页,大象出版社,2012年。
- [2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 [3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 [3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商周遗址》第140页图七二,文物出版社,2011年。
- [33] 刘富良:《洛阳西周陶器墓研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
- [34] 同[7]。
- [35] 同[24]。该文中BbI、BbII式陶鬲与本文的BIII、BIV式陶鬲形制相同。
- [36] 张礼艳:《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期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1期。
- [37] 同[36]。
- [38]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c.王晓毅、严志斌:《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第1版。
d.何弩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2版。
- [39] 蔡全法:《新郑市中行东周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
- [40] 蔡全法、马俊才:《新郑中行商周及汉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文物出版社,2000年。
-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 [4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19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2期。
- [44] 王光永:《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商周青铜器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
- [45] 路国权:《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年代的再认识及相关问题》,《考古》2011年第8期。

(责任编辑 苗霞)